04-吳翠松 1/14/2008 9:31 PM 頁面 3

一般論文

文字時代的口語人：一個初探性研究*

吳翠松**

智慧藏

* 本文取用自研究者博士論文之若干材料。研究者由衷感謝十七位報導人及鍾蔚文、趙雅麗、方念萱、黃鈴媚和陳世敏老師於論文撰寫過程的指導。對兩位匿名評審及編輯的用心與寶貴意見，研究者亦一併誌謝。

** 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助理教授。E-mail: tswu@nuu.edu.tw

04-吳翠松 1/14/2008 9:31 PM 頁面 4

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生活在文字時代的文盲（即口語人），[1]其口語表達特色為何？及目前的文化環境，是否影響其口語表達行為？在文中，研究者結合Ong、Swidler 等人的觀點，以媒介文化工具箱的運用作為觀察重點。經由田野觀察發現，文盲日常生活的口語表達特色，在於大量使用俗、諺語與角色扮演等口語文化工具箱，但偶也使用文字文化所慣用的資訊搜尋與記錄工具，及抽象、分析、三段式邏輯推理等思維工具，以達其意圖。故雖未受正式教育，但文字文化對文盲的口語表達行為，仍產生某種程度的影響。

關鍵詞：口語表達、文化工具箱、文盲、口語文化、套語

智慧藏

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母親住南部鄉下，外婆家中小孩眾多，因爲家貧加上性別關係，大阿姨、二阿姨、三阿姨都未受教育。從小，筆者一直對這些不識字的親戚，在充滿各式不懂訊息（文字）的環境中，如何生活、解決問題，或與人溝通，感到非常好奇。雖然她們不識字，但感覺上似乎和識字人沒有差別，一樣工作、看電視、坐車到遠方、和人殺價，甚至打麻將，與一般想像中的文盲無法適應文字環境，有段差距。因著這層緣由，本文想知道在這個充滿文字的世界，文盲怎麼生活？怎麼解決問題？怎麼與人溝通？這個文字社會，對其又造成什麼影響？

筆者另一個研究起點則是源自於 McLuhan（1964／葉明德譯，1978）「媒介就是訊息」的說法。依照麥克魯漢所言，不同媒介使用會造成不同生活、思維和溝通方式，如果此話爲眞，那麼或許可以反過來提問：不使用文字媒介作爲思維和溝通工具的文盲，其生活和思維方式是否與識字人不同？不過，這是個大問題，同時涉及文盲和識字人兩個族群，且生活和思維的概念範圍太大，故而在此，本文先以文盲的口語表達，作爲研究起點，探討文盲的口語表達特色？及這個充滿文字的環境，對其口語表達行爲，是否產生影響？

貳、文獻探討

關於人類口語表達行爲研究，各學門有其觀察對象及角度，甚而某些學門已發展出較完整的理論架構。例如，發展心理學研究發現，兒童口語表達能力，隨年齡和心智發展，有漸趨複雜趨勢。在字詞部分，會從原本的單音、單字，到各種不同詞彙的組合；在文法部分，則從簡單句、主被動式、複雜句，到各式完成時態的運用（Nowacek, 1993）。

傳播學中有關口語表達行爲的研究也不少，像是強調修辭及演說技巧的演說教學研究（馬成龍，1999），或強調口語表達結構、秩序互動

的言說分析（Thompson, 1984）。但此類研究大半集中在語言身上，與本文主題無關，反而媒介生態學者 Ong（1982）所提論點，可作爲思考的入口。

一、媒介文化說

Ong 曾延伸麥克魯漢「媒介就是訊息」說法，提出以重要傳播媒介作爲文化發展劃分依據的媒介文化觀點，詮釋心靈組成與口語表達行爲（Strate, 2002: xi）。在此，所謂重要傳播媒介，指的是對人類生活、思維、溝通方式造成重大影響的工具與技術，例如口語、文字、電子技術等。Ong（1982）談到，在討論人類思維與口語表達行爲相關因素時，媒介爲一極重要因素，媒介的出現，造成其他社會發展加速，進而導引出更大的社會、思維及行爲變遷。但絕不可將媒介與其環境因素完全分離，因在一個文化系統中，媒介、語言系統、教育、文化等因素，乃是緊密結合、不可切割的整體，彼此互相影響。例如識得文字，通常是經由正式學校教育而來，然教育內容及文字系統，又與文化有著深深關聯。故而在討論口語表達行爲時，必先了解所處媒介文化情境。

在 *Orality and Literacy: The Technologizing of the Word* 一書，Ong（1982）更進一步指出，人們所處的媒介文化，對其生活、思考及口語表達方式，產生重大影響，亦即在不同媒介文化中，人會有不同的生活、思考及口語表達方式。他並以口語、文字[2]及第二口語（即電子）[3]文化等辭彙，說明不同的媒介文化生活方式。

進一步地說，口語文化是以社群、而非個人方式組成社會組織，人們的自我認同主要透過社群定義，個人的意義取決於其在社群的位置（Chesebro & Bertelsen, 1996: 148）。當社群中人發生爭執時，族人傾向尋求耆老仲裁，而傳統習俗爲仲裁主要依據；知識內容大半與生活情境相關，知識之取得，主要源自於學徒制與邊做邊學方式；活動範圍較小（Ong, 1982；Finnegan, 1988）。

但在文字文化中，由於生活相關訊息多以文字和圖象構成，不論是

搭車、購物、電器使用等動作，只要看著文字說明，知道如何操作即可，故而大半行動能夠透過個人獨立完成，社會以個人爲組成基礎。人們的紛爭，不再需要耆老，主要以律法和契約方式解決。教育採學校及集體一對多的方式進行，傳授的內容，除了生活所需的基礎智能外，還包含許多抽象、與生活事物不直接相關的知識；各式交通工具出現，活動範圍較大（Ong, 1982；Finnegan, 1988）。

延續 Ong（1982）的論點，Donald（1991）曾引申討論兩種媒介文化思維的分別。他指出，口語文化思考特重敘事（narrative），文字文化則傾向理論式思考。敘事注重的是意義分配，理論不強調意義，只是把事情分割、分析，建立原則。口語和文字文化所形成的資訊處理及意義產製過程，有某種程度的差異。

但口語／文字的二分方式，曾遭不少學者質疑。Goody（1987）直言，將文化劃分爲口語和書寫，並指其爲截然不同的兩種文化形式，是個錯誤，因爲口語社會中的某些特質，仍持續出現在文字社會。口語文化的影響，未在文字文化消失，而是與其融合。

Chafe（1982）的研究就發現，許多口語文化的正式儀式語言，其內容通常亦具文字書寫的整合性和分析性。即在某些情境中，語言的使用同時涉入口語文化的韻律表達與文字文化的複雜句法結構。

Gee（1994）則認爲，口語文化的敘事特色，並非完全與文字文化所強調的形式、明確性及複雜性相對立，所以區分口語／書寫（speech/writing）或口語性／文字性（orality/literacy），是有問題的。

Finneagan（1988: 84）甚而談到，在文字和口語文化中，確實有些有趣差異，但這些差異還比不上文化內的差異。

在八〇年代初期，Finnegan（1988: 126-138）曾於英國白金漢郡的 Milton Keynes 鎮，以參與觀察方式，進行有關音樂構成與表演的研究。他發現，即便在 Milton Keynes 這個電子媒介充斥的城鎮中，仍同時存有文字文化發展而成的古典音樂、具有強烈口語文化風格的爵士樂，及融合兩種文化表演模式的搖滾音樂等三種不同音樂構成及學習表演

模式。易言之，即便在同一文化中，其學習和技能表現的方式，仍相當多元混雜。

關於此點，Ong（2002）承認，文化確實是一種連續和混合體，且如 Finnegan（1988: 178）、Olson（1994: xv）所述，我們很難畫出一條清楚明確的界線。不過爲了便於分析，只能依其組成偏向，以口語／文字說明之。

換句話說，在 Ong 所述口語文化中，並不排除文字文化影響性的涉入，只不過其影響可能不似口語文化那麼大。而所謂表達特色，也是一種程度多寡和偏向的說法，並不意謂識字人就沒有口語文化的表達特質，只不過受文字文化的影響可能更大些。

另一方面，Ong（1982）也強調，口語和文字文化生活及思維方式，各有優劣，無高下之別。如同 Levi-Strauss（1966: 269）在 *The Savage Mind* 一書中，針對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差異指出，身處於這兩個社會的人，是使用不同「科學思考模式」，這兩種模式並非發展階段的不同，而是本質上不同的科學提問方式。傳統社會強調的是具體，現代社會崇尚的是抽象，兩者各擅勝場，不分雲泥。

至於文化環境與媒介工具的關係，及其對思維行動的影響，Swidler（1986: 276）談到，不同文化會形塑不同的文化工具箱，文化之於人類思維行動，即是透過形塑各式習俗、技能和風格的常備劇目（repertoire）或工具箱（tool kit），讓人建構自己的行動策略，使行動者得以在一定自主空間裡，選擇性地運用不同的文化元素，建構具社會意義的行動策略。

在 Swidler（1986）定義中，行動策略的形成，主要包含且倚賴習慣、感覺及世界觀等文化工具箱。而文化工具箱，指的則是生活風格與習慣的實踐，其具體內涵包括信仰、日常生活實踐、藝術形式和儀式舉行，以及各式訊息實踐，如語言、聊天、故事和日常生活中的例行公事。這些生活風格、習慣實踐，甚而是思考事情的方法，即是我們賴以解決各式問題的依據（Swildler, 1986: 277）。

Swidler（1986）認爲，透過文化工具箱的使用，一些在社群中共享的行爲模式及觀點得以產生，並且藉由工具箱中各種工具的不同聯結，人們得以解決各式問題。故，文化工具箱的影響，主要在行動策略選擇層次上，而非行動結果；文化的因果意義，非爲定義行動目標，而在提供一些可用來建構行動策略的文化元素。

如果將 Ong（1982）和 Swidler（1986）兩人的論述加以整合，可得出下列結論，即：不同媒介文化會形塑不同文化工具箱，在日常生活口語表達行爲中，人們即是利用這些文化工具箱，解決問題以達成目的；但反過來說，人們在從事問題解決及口語表達時，也受文化工具箱的影響。

二、文化工具箱

前面談到，不同媒介文化會形塑不同文化工具箱，日常生活的口語表達行爲，就是透過這些文化工具箱的使用而來。那麼口語／文字文化，又形塑哪些文化工具箱呢？

（一）口語文化的文化工具箱

1. 記憶式思考：套語的使用

在口語文化中，由於使用短暫易逝的口語媒介作爲主要溝通工具，人們無法記錄和記憶大量資訊。然而日常生活，又有許多問題的解決，須植基於記憶之上，故設法讓自己記得住、記得牢，就成爲重要的問題解決工具。

對此，Ong（1982）認爲「記憶式的思考」十分重要，也就是以一種便於記憶的方式，處理各式資訊。而如何將記憶式思考發揮最佳功用，則與套語（formulas）使用有關。

所謂套語，指的是一組在相同韻律下，被規律使用以表達重要既定概念的字詞（Parry, 1928/1971）。一些常見的方式，像是採取韻律節奏、平衡模式、不斷重複或對偶、頭韻和諧音、形容詞和其他慣用語的表

達法，或建構標準主題情境（像是用餐、決鬥、英雄的幫手等），以及那些不斷被說與聽的俗、諺語，皆屬之。

有關套語的說法，最早來自口傳文學（oral literature）[4]相關研究，並可回溯至 Parry（1928/1971）對於《伊里亞德》和《奧狄賽》兩部口傳文學的研究，再經由 Lord（1960）、Havelock（1963）補充研究而完成。

Parry（1928/1971）對於《伊里亞德》和《奧狄賽》所做的研究，即是歷史上著名爭議的「荷馬的問題」（Homeric problem）。焦點是探討《伊里亞德》和《奧狄賽》的作者荷馬是否眞實存在，及這些史詩是否只由單一男子所著。研究者之所以提出這個論題，是因爲在那樣的年代，並無文字可保存這麼長的故事，但它卻被記錄下來，且流傳至今。

對於荷馬是否眞爲兩篇長文的作者，素有不同看法（Ong, 1982）。Wood（1775；轉引自 Ong, 1982: 19）相信荷馬非識字之人，是記憶能力使他產製這些史詩。Parry（1928/1971）則認爲，也許荷馬不是史詩原創作者，但可能作了相當程度的整理工作，並透過某些便於記憶的呈現方式，使兩部作品廣爲流傳。

至於究竟是哪些便於記憶的呈現方式？Parry（1928/1971）分析發現，荷馬史詩的語言特色及其結構，主要乃透過標準化的套語公式（standardized formulas）組合而來。其標準化的套語公式，圍繞在標準化的主題（standardized theme）之下形成，像是議會、召募軍力、挑戰、勝戰的搶奪、英雄的盾牌等。另外，主題聯想、重複敘述亦是荷馬史詩構成的一大要素。而這正是荷馬史詩在那個時代得以廣爲流傳的因素，也是許多口傳文學作品中常見的語言及結構特色。

這樣的語言及結構特色，除了便於記憶外，也對使用者產生某些影響。Bynum（1978）強調，由於套語的成組原則，使得所謂的重要概念，並非清楚的構想，而是一種虛構，且大部分由潛意識事物所組成，故套語使用者不見得是有意識的使用著套語，但在其日常生活中，很容易會展現出某些固有想法及韻律節奏。Ong（1982: 24）則把 Parry 提到的

formula、formulary、formulaic 等字，理解爲在詩中重複組合的慣用語和表達方式，並認爲這些表達方式之於口語文化，比在其他文化中，更具重要性和說服性。

Parry（1928/1971）的套語理論，除可從口傳文學發現外，後續學者亦曾進一步探究近代某些口語文化盛行地區。Lord（1960: 17）指出，南斯拉夫文盲吟唱詩人在表演時，一再使用標準化的套語聯結標準主題，且其使用的套語及主題雖差不多，但在每個演出中，卻以不同方式被組合。Tannen（1980）表示，在某些阿拉伯和地中海口語文化盛行區域中，仍可看到相當濃厚的套語思想和表達方式。換言之，即便在已進入文字文化數百年的現代，套語思想和表達方式對某些口語人的影響，仍不容忽視。

套語理論影響人類學及文學史學門甚深，並造成相關學者陸續投入研究（Holoka, 1973）。密蘇里大學教授 J. M. Foley，就於 1986 年創辦了《口語傳統》（*Oral Tradition*）期刊，[5]針對過往及現存許多口語文化的套語使用，做了相當多介紹與研究。至於台灣，近年來亦有學者投入套語研究。1974 年，本名王靖獻的詩人楊牧，即採取用 Parry 的套語概念，分析中國傳統古籍《詩經》的內容（陳惠英，2000.06）。陳龍廷（2005）則將其運用在布袋戲演出研究上。

2. 角色扮演工具

Ong（1982）、Havelock（1963）均認爲，對於口語人而言，「學習」或「理解意義」這件事，是透過與被認識之人、事、物的同理和認同過程而來，故他們較習慣以同理、參與式思考，來表達敘事及解決問題。關於此部分，可從口傳文學敘事方式看出端倪。Brewer（1985: 189）研究口傳敘事發現，口語人在說明人物角色時，較少性格描述，若敘事者想介紹角色性格，多半是經由「表演展示」（performance/showing）的途徑進行。造成此處敘事差異之因，Finnegan（1967: 52）解釋，在書寫故事中，角色資訊較難在同一頁面表現出來，須以敘述補強，但在

口語故事中，表演者可當下演出情境和內在狀態，所以有些資訊不必清楚說明。

關於口語敘事的特質，在台灣原住民口傳文學的研究上，也有學者提出看法。巴蘇亞．博伊哲努（1996：42-46）[6]採集原住民耆老的敘事發現，口傳文學講述者在角色扮演時，特別重視兩大元素：(1) 聲音的效果：爲了模擬實況，或藉聲音的表達抓住聽眾，在傳遞時，會將一些極關鍵性的對話或擬聲詞刻意留下。(2) 肢體語言與表情的運用：爲了吸引注意，往往會依照故事情節的進行，視主人翁的行動，配合手勢，加上喜怒哀懼等種種表情變化。

當然，使用套語與角色扮演，非口語文化特有，其所強調的固定、韻律平衡、重複，與重視聲音、肢體語言、表情運用等表達方式，偶爾也能在文字文化中找到，而的確，我們也可在一些文字書，或在一般識字人的口語表達中，察覺到此種現象。但在口語文化中，這些表達方式不是偶然，而是一種持續不斷的現象。它們形成口語文化思想的實質內容。以任何延伸形式形成的思想都不可能沒有它們。

（二）文字文化的工具箱

關於文字文化所可能形塑的文化工具箱，McLuhan（1964／葉明德譯，1978：6）曾談到，古騰堡發明活字印刷術，使得文字書籍得以大量複製。大量充斥的書籍，創造出的文字線性排列環境（不論是直書或橫書），改造了人的感知能力，使人不論在思考或行動時，都傾向以線性序列的方式進行。

Ong（2002: 468）更進一步指出，序列及線性組織的思考方式，是書寫系統的根本。在這種「線性推理思考」的要求下，強調線性因果推理過程的「抽象思考」（Ong, 1982；Havelock, 1963）、「三段式邏輯推理」（Goody, 1977）、「分析式思考」（Ong, 1982）等文化工具箱，也隨之出現。另因文字的發明，致使資訊大量出現，再加上文字具象化和客體化語言，讓語言得以被細緻比對，亦形塑出資訊搜尋與記錄工具（

Chesebro & Bertelsen, 1996）及精確測量工具（Olson, 1994）等文化工具箱。

1. 抽象思考

Ong（1982）認爲，在文字文化中，由於人們不需透過親身經歷即可獲得知識，再加上資訊大量充斥，致使人們必須尋出一些便於理解事物的方法。而如何尋出事物共同屬性進行概念分類，及以概念進行思考，就成了生活在文字文化情境必須面對的課題。這個部分，就與一個人的抽象能力有關。

所謂抽象思考能力，指的是從具體事實抽離出概念，以概念爲媒介進行思考的技能。根據 Scribner & Cole（1981）的說法，抽象能力可從三部分觀察：挑出事物共享屬性的能力；靈活的從某屬性轉移到另一屬性（如從大小轉到形狀），作爲建構分類標準的能力；提供一個標籤給某一類別（即替它命名），作爲解釋類別成員的基礎。

Ong（1982）、Havelock（1963）的研究亦發現，具文字文化背景者，在面對大量資訊時，較習慣以歸納分類方式，挑出事物共同屬性，或以概念爲媒介進行思考與事理說明。

2. 三段式邏輯推理

在各種思維工具中，人類學家 Goody（1977）特別強調文字文化對於三段式邏輯推理能力的激發。所謂的三段式邏輯推理過程，可分爲結論和前題兩部分。前題可再細分成大、小前題，依循著大、小前題的條件限制，語言使用者將可透過邏輯推理方式，得出最後結論。例如，依循著名的大前提「凡人皆會死」，小前提「孔子是人」，我們可得出「孔子會死」的結論。

三段式邏輯思維能力之所以能在文字文化中育成，Goody（1977）解釋，此乃因文字能將人們所說話語固定，人們即可掌握口語流動，並一步步比較在不同時間、地點發表的言說，也可更明確分離各個文字，操弄順序，分析和了解文字矛盾之處，故得以發展三段式推理形式。

3. 分析式思考

Chesebro & Bertelsen（1996）指出，具文字文化背景者，較傾向以分析式思考，進行事理的說明。所謂分析，指的是將某個整體事物，分解出組成元素的過程；至於分析式思考，指的則是透過相關訊息的比對和分解，以論述事理、發表意見及說明事物因果關係的思考過程。在進行分析之際，證據和理由的提出相當重要，而事理或事物相關知識的陳述，也有助於說服聽者（謝錫金，1998）。

關於文字文化促成分析式思考一事，Ong（1982: 72）認爲，文字造就了視覺導向，視覺導向易造成人與事物疏離（isolate），將觀察者置於被觀察事物之外，使其與被觀察事物間產生距離，故而文字易造成分離、分析的思維。

這種分析式思考，使人們在故事敘述時，較易以分離方式呈現，例如在說明故事人物的個性上，口語人常以角色扮演及表演的方式呈現，文字人則習以旁白敘述的方式進行（Brewer, 1985）。

4. 資訊搜尋與記錄工具

前面談到，在口語文化中，資料搜集及記錄的主要工具是人腦，爲便於記憶，口語文化形塑了套語工具箱。但在文字文化中，由於已有可取代記憶的文字和記錄資訊的工具，再加上正式教育機構林立，故而，如何使用輔助記憶的外在工具，並且安排這些大量出現的資訊，便成爲文字人必須發展的技能。

眾所周知，爲了因應龐大資訊流通需求，文字文化發展出各種資料搜尋、記錄和提取系統，及輔助資訊整理的思考工具，像是圖書館、字典、百科全書、索引、資料庫、筆記本、備忘錄等協助資訊整理的文化工具箱，解決人們所遭遇的困難（Chesebro & Bertelsen, 1996: 117）。

5. 精確測量工具

關於口語與書寫表達差異的問題，Chafe（1982）指出，書寫慢於口語的事實，使得書寫語言不像口語這麼破碎，且更重視句法的整合。

它讓作者有時間以更複雜、精確的方式提出其概念，甚至能使用一些很難在口語中被呈現的複雜辭彙和句法。

Olson（1994）和 Ong（1982）分別觀察到此一媒介差異所造成的影響，亦即，當文字發展愈細緻時，它所能提供的口語模式愈精確，該文化也會發展出更完備的評估標準，以判定某兩句話是否字義相同。例如時態（過去式、現在式、現在完成式等）、標點符號（Morrison, 1987）等，即是這種精確要求下所發展的文化產物。

當然，資料搜尋與記錄工具、精確測量工具、分析思考、抽象思考、三段式邏輯思考等，是否眞如 Ong（1982）、Goody（1977）、Olson（1994）所述，是受文字媒介促發，或口語人就不具備這些文化工具箱，這些論點尚値得爭議。不過，不論文字媒介與這些文化工具箱的互動關係爲何，相關的文化研究已顯示，由文字所中介傳播行爲的社會，確實較口語文化展現出更多的抽象、分析、三段式邏輯推理等思考技能（Chesebro & Bertelsen, 1996: 116）。

綜合上述文獻得知，人們所處的媒介文化環境，會形塑其特有的文化工具箱，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即是利用這些文化工具箱，解決問題及達成目的。如果說，口語文化形塑套語、角色扮演等文化工具箱，文字人慣以抽象、分析、邏輯推理等方式進行口語表達，那麼生活在文字文化的口語人（文盲）又使用哪些文化工具箱？是否受環境激發，而有不同於口語文化表達方式？其表達特色爲何？

參、研究進行

一、研究樣本

本研究對象爲目前生活在台灣社會，未受任何文字教育的文盲。何謂文盲？從字面來看，指的是不識任何文字系統的人。

關於文盲的定義及篩選問題，一直是本研究難題。首先，在以國語

作爲正式學校教育語言的台灣社會，有人會認爲，文盲就是不會說國語的人。但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發現許多人雖不使用國語，但卻受過正式的日本學校教育；[7]另有些人雖未進過學校，但透過教會系統的教導，[8]也習得大量文字，並具備初步寫作能力。故會不會說國語、有無進過學校，或可作爲初步篩選機制，但是否不識字，還須進一步了解才能確認。

其次，在台灣，由於各式資訊充斥、媒體普及和九年義務教育的推行，欲尋訪完全不識字的文盲，可說非常困難。筆者所接觸的對象中，有人雖未進學校受過教育，但因媒體或子女的影響，或多或少識得一些簡單的文字，像是十個阿拉伯數字、自己或家人的姓名。換言之，如果純從完全不識字這個角度檢視，台灣目前很難找到文盲。

既然有無接受學校教育，以及是否認識簡單文字，都不能作爲評判的標準，那麼台灣官方又是如何界定文盲呢？根據主計處的定義，所謂識字者，指的是「年滿十五歲以上之人口，在日常生活上能閱讀普通書報並有書寫簡短信件能力者，反之則稱之爲不識字者」。亦即，文盲意指那些無法閱讀普通書報，且沒有能力書寫簡短信件的人。但這項定義並沒有明確具體的操作說明，涵蓋範圍也過於廣泛，若循此準則，部分受過正式國小教育、但不具簡短信件讀寫能力的人，可能被歸於文盲類目之中。

1993 年 9 月，美國教育部公佈了一項有關成人識字的歷史性研究。在此份報告中，當時的全國成人識字調查小組（National Adult Literacy Survey）強調，識字的定義須隨歷史情境而有所不同，像是美國建國前，能在文件上簽字就算識字，但在現今社會中，所謂的識字，還包括個人對各類文字資料、圖表的了解、比較和分析；同時，該小組也特別強調「文盲」與「識字」間，不該是兩個截然不同的類目，而應被視爲一連續狀態，並無特定的界限或臨界點（West, 1993）。他們並發展出一套測量識字能力的量表，將識字能力分爲五個等級，分別從文章認識、文件認識及數字認識三大部分進行測量。

在此，綜合兩大評估標準，本研究以自我報告、簡短信件書寫能力、文章認識、數字認識等能力，配合台灣教育系統教學資料，作爲篩檢研究對象主要依據。

相關篩檢程序如下：首先，研究者先詢問報導人（即研究對象）是否曾進入學校讀書或受過教育，如無，則納爲初步篩選名單。接著，再進行簡短的讀、寫能力測驗。在信件書寫部分，研究者要求報導人寫一小段欲告訴家人的話語（由報導人自行決定），測試是否具簡單的書寫表達能力；在文章認識部分，研究者以小學一年級的國語課本請報導人誦讀，測量其正確率；在數字認識部分，則以大賣場 DM 上的價格標示，要求報導人說出正確數值。上述三個測量標準，如正確率皆未達 10％以上，則納爲研究對象。

必須說明的是，以 10％作爲篩選標準有其現實考量。一來，如前所述，在台灣目前情境下，要找到完全不識字的「純口語人」，恐怕是不可能任務，故以最低標準 10％作爲篩選門檻；再者，也無此必要，因爲事實上，就前面文獻及美國識字調查小組所言，口語－文字文化並非截然二分，而是程度多寡之別，每個人身上或多或少同時受到口語與文字文化影響，故尋訪一些更具口語文化偏向特色的人，便足以納爲研究對象——那些自述未接受過正式學校教育，及不識大半文字的報導人，即使不是純文盲，但不論從其早年的成長經歷、現在的生活情境和所受教育來看，都可算是在這個充滿文字的時代中，更偏向口語文化極端的人。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關注人們所處的媒介文化，及其所形塑之文化工具箱，對口語表達行爲所造成的影響，因此，媒介環境與文化工具箱的使用，是爲研究重點。本研究對象大半爲研究者親友或親友介紹之長者，由於關係密切，遂得以與報導人做較深入互動及日常接觸。本研究共費時兩年完成，採取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法，收集十七個案，主要來自於高雄縣、

台南縣、台南市、台中縣、彰化縣、澎湖縣等六縣市。這些報導人均爲女性，年齡從五十歲到八十幾歲，全部使用閩南語。報導人基本資料如附錄表 A。

肆、研究結果

一、報導人生長背景

前面文獻談到，人們所處的媒介文化環境，會形塑其特有的文化工具箱，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即是利用這些文化工具箱，解決問題及達成目的。是故，如欲了解報導人口語表達行爲與文化工具箱使用情形，須先由其早年生長背景和目前生活環境談起。以下爲研究者藉由社會組織、交通環境、規範方式、媒介環境等四個面向，針對報導人生長背景所做的說明。

（一）早年生長環境

1. 社會組織

本研究十七位報導人雖來自台灣各地，且婚嫁後各有不同遭遇，例如李嬸嫁作商人婦、夏奶奶的丈夫是個船員，但其共同之處，即都生長在人口眾多的務農家庭。

因務農需要大量勞力，故重男輕女觀念相當盛行。身爲女性，她們較少機會接受學校教育，通常在年紀很小時，便得幫忙家事、照顧弟妹，及至長大些，又須隨家人前往農田工作，再長些，出嫁從夫，仍是辛勞持家和下田耕種；相較之下，她們的兄弟大多能接受正式的小學識字教育。

婚後，所有報導人都與先生的原生家庭一起吃住，形成一個大家庭體系。生活在同一個屋簷下，分擔家事，勢必也形成許多相處上的問題，像是婆媳、妯娌（閩南語稱作「東西」）關係，就成了當事人印象最深刻及最常談論內容。

2. 交通環境

由於經濟不富裕，多數人投入勞動工作，少有時間從事休閒，亦無太多交通工具，故而活動範圍不大。根據報導人劉嬸的說法，當時要是有一台「鐵馬」（腳踏車），即算是相當富裕的家庭。另一方面，由於活動範圍有限，加上農忙時，多採集體作業方式，互助收割，因此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相當親密。

3. 規範方式

許多報導人提及，日據時代的「管區」（即警察），在鄰里間擁有相當大權力，里長的地位則等同於地方耆老，亦深受敬重。像是報導人阿玉回憶，當她與婆婆發生爭執時，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去找里長仲裁，當然，里長也很清楚地方上的人事物關係，自然也會再找「重要的關係人」來做調停。

4. 媒介環境

泰半報導人早年家中都無電話、收音機、電視等電子媒介，資訊或政府政策相關消息之取得，主要靠鄰居相傳或村長挨家挨戶通告。以「三七五減租」及「公地放領」政策爲例，便是靠村長親自到家裡告知和說明，主要傳播媒介爲口語。

整體來說，報導人早期所處生長環境，包括以社群組成社會組織、活動範圍小、村人間互動密切、耆老爲重要仲裁者等特質，較傾向口語文化組成方式。

（二）目前生活環境

1. 社會組織

研究者所接觸的報導人，目前大多生活在人際互動較爲頻繁的社群中，像是澎湖七美、[9]台南善化、台中內埔的土城鄉、高雄茄定等，都是一些較小的村落。在此環境中，人際互動密切且熟悉，村裡發生的大小瑣事，均爲村人所熟知。

由於承襲著父系社會的觀念，多數報導人即便生活在現代，仍覺得要兒子奉養，財產不必留給女兒，而她們也確實和兒子的家庭住在一起。與家人的互動關係密切。

2. 交通環境

在參與觀察過程中，許多報導人幾乎每天與村民聚在一起下棋、聊天，並經常到其他人家中走動。除了以兩腿爲主要交通工具外，有些報導人會騎機車在村落移動，但因不識字，故無駕照。劉嬸就戲稱自己是「騎身份證的」，不過由於移動範圍不大，也很少遭警察取締。

雖然日常僅在有限區域內活動，但多數報導人都曾參加進香團，或出國旅遊；即使不曾出國，她們對於台灣地理，仍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像是張阿嬤、阿玉、楊嫂，都知道台北的位置在桃園之上，李嬸甚至能指出台灣在世界地圖上的位置；在事務討論方面，也會提出一些對於政治、公共議題上的見解。

3. 規範方式

由於村人互動密切，所以報導人都很怕他人閒話，而村人的想法，就成爲日常生活行事重要的規範依據，但如發生重大事件，還是會請出家中長輩男性仲裁。儘管十分重視村人及耆老意見，卻不表示報導人不知道或不遵照文字文化中白紙黑字的規範。例如採訪那年，台灣南部下雨不豐，許多報導人都知道政府鼓勵人民休耕，並可取得補貼。只是這些規範方式的知識取得，主要仍是透過地方耆老或家中男性告知，而且對於規範的細節內容，亦非眞的清楚。

4. 媒介使用

不過在媒介使用上，則與早期生長環境大相逕庭。一般家庭裡，洗衣機、冷氣、電鍋等電子用品皆俱。許多報導人雖不使用電腦，但了解其用途，至於電視、電話、收音機等電子媒介，則是平常用來獲取資訊、娛樂自己和與人溝通的重要媒介。例如楊嫂經常打電話向組頭簽牌，阿玉則有一隻專屬自己的手機。

不難看出，報導人目前所處的環境，可說是混合口語文化（人際互動密切、活動範圍小）及文字文化（具少許抽象知識、各種媒介充斥）的社會。

綜合報導人早期生長（口語文化偏向）及目前生活環境得知（混合口語和文字文化），她們同時受到口語與文字文化的影響，故其口語表達特色，不可單以口語或文字文化特質觀之。

二、報導人口語表達行爲

不同的文化工具箱，豐富了人們在日常生活的口語表達行爲，也提供了解決問題或達成目的之協力。那麼，生長在口語與文字文化混合環境中的文盲，使用了哪些文化工具箱？又具有哪些口語表達特色？

（一）口語文化工具箱

1. 角色扮演工具

根據田野調查所得，研究者發現，許多報導人都是說故事高手，談話充滿吸引力，常讓人覺得像在看戲。例如，在敘述早年故事時，不少報導人會不斷變換聲調，許多時候，筆者是從她們的聲調中，辨識其角色扮演的對象。

不似文字文化習慣採線性敘述，偶爾穿插一些引語加以描述，或在使用引語時標註發言者身分。本研究的報導人常會在說話時，直接轉變聲調，而不提示現在是誰在講這些話，故而必須認眞留心地辨視其聲調，否則稍一閃失，便聽不懂她在說什麼，還得要求再重說一遍。

舉例來說，阿玉談到，初嫁入先生家，半夜兩點爬起來煮飯，卻發現大嬸已在廚房忙錄時，她急忙問大嬸：

> 「嫂子嫂子，我問某人說兩點起來煮就來得及，妳怎麼這麼早就起來煮？怎麼樣妳甘知？〔她問研究者，研究者還來不及回答，她接著就變尖銳聲音說〕人家好命可以睡飽飽，我

吵妳無眠，我吵妳無眠這麼早起，妳快去睡飽飽。〔停頓一秒鐘〕齁，快要嘔死就哭了，到房間哭，在那裡嘔，怎麼嫁尬這麼歹命，我剛初來都還不認識，妳為什麼要這麼嚴厲虐待我。」

研究者初時聽，不太懂阿玉在說什麼，後來反覆聽錄音帶，一段段分析才知道——她有時是扮演自己（「嫂子嫂子，我問某人說兩點起來煮就來得及，妳怎麼這麼早就起來煮？」），有時又變聲扮演大嬸（「人家好命可以睡飽飽，我吵妳無眠，我吵妳無眠這麼早起，妳快去睡飽飽。」）；爲了增加與聽者的互動，她還會不斷詢問聽故事的人（「怎麼樣妳甘知？」）；最後甚至下評語，講自己內心的獨白（「齁，快要嘔死就哭了，到房間哭，在那裡嘔，怎麼嫁尬這麼歹命，我剛初來都還不認識，妳為什麼要這麼嚴厲虐待我？」）——所有這些資訊的轉換，全部依賴語氣的變化，沒有任何連接詞或前面的提示。

另外一個讓研究者覺得報導人像在演戲的特色是，有些人說故事的用詞，非常文言、簡短又準確，有時甚至會使用一些戲劇性的台詞。像是李嬸談到公公說要分食（即分家），問她：「某某人，人家說要分食，妳要不要分？」李嬸回答公公：「阿爹，我也沒生子男兒，我一個人而已，我怎麼有資格說要分還是不分。」「生子男兒」這樣的話語，是台灣早期歌仔戲的用語，在日常生活中，很少會使用這樣詞彙。

許多報導人講故事時，還會神入、移情地扮演當事人，戲劇感十足。假設聽者已熟悉故事中的人事物，她們便會直接說出那人的名字，之後再作附註說明；有時她們根本就不理會旁人是否認識故事所說的人物，在敘述時，就直接扮演角色，叫出對方名字。比方阿玉在談到大嬸說她跟大伯有染，請來幫忙的人爲她抱不平時，她說：

「我們有請一個女人一起幫忙，那個女人說，哎喲，月琴啊〔變聲，拉高聲音〕，我大嬸叫做月琴〔變聲，以平時的聲

音說〕，哎喲，月琴啊〔變聲，拉高聲音〕，妳不要這樣，妳不要亂講話，妳說的都不對，妳不要亂講話，妳會被打死，會死的，那打下去會死的，妳這樣難怪被人家打，妳都亂講話，講的都不是話，妳不要這樣，我今天來聽到，妳說的都不對去，人家阿玉啊，我名叫阿玉啊〔變聲，以平時的聲音說〕，我那時候不知道她的名字〔變聲，拉高聲音〕，她也沒怎樣，她問說要做什麼，也沒有什麼不對啊，人家她好嘴問他，是小嬸啊，對不對，她好嘴問他，他好嘴應她，也是對的啊。」

如同 Brewer（1985）所言，口語文化敘事特色，在於「表演展示」（showing），而不是以敘述（telling）的方式來作說明。阿玉講故事時，無異使用了口語文化的「角色扮演工具箱」，故她在敘事說明時，才會以這種神入、移情的方式呈現。

2. 套語工具

早年的台灣，少人識字，輔助記憶的工具亦缺，在這樣的口語文化環境下，發展出相當多的套語工具，如俗語、諺語、典故，早已於民間大量使用和流傳。也由於從小就身處在這樣的文化情境中，許多報導人在說話時，很習慣會夾雜一些俚語、俗諺或典故。

諸如，在抱怨兒子不孝時，蔡嬸隨口說了句：「寵豬舉灶，寵子不孝」，感嘆早年先生太寵兒子種下的惡果；在討論電視節目時，阿滿無意間下了句評語：「沒彩錢，請鬼拿藥單，沒彩那些錢」，認爲媒體邀請政治人物根本是浪費錢；在巡視自家農田，談到隔壁工廠排放的污水，影響農作物時，二嬸婆慨然說道：「千金買厝，萬金買厝邊」，強調鄰居的重要性。

除了使用富韻律的俗諺評論時事、發抒情感外，有些報導人日常生活所使用的話語，也相當具有韻律性。像在敘述個人生命經歷時，阿玉曾談到早期離家出走，養母訓誡她的情形。她說當日因爲和婆婆吵架，

忍不下那口氣，跑去找村長仲裁，結果村長特地載養母來調停，沒想到養母一張嘴就對她破口大罵：

妳是要被人算貨[10]（sng hue）　還是要被人算塊（sng tue）
工作學就會（tiau e）　凡事著忍耐（Jim nainn）
忍耐就妳的（li e）　妳若忍耐不住（be tiau）　妳就連回（lian hue，丟臉）

養母的意思是要阿玉忍耐，當個好貨色被人尊重，不要像一塊一塊的東西，嫁完一家再嫁一家，沒有好歸依。結果，養母罵完後，又帶她去跟婆婆道歉，沒想到這時婆婆反而不好意思，覺得自己罵得太兇了。

從上面這段話語的中文及羅馬拼音中，可以看到養母運用了相當多口語文化的套語工具。如「妳是要被人算貨，還是要被人算塊」，就使用了「對仗」；而「算塊、就會、你的、連回」等字，以閩南語來唸，全爲「e」的發音，則是使用了「押韻」。

另外，在這段話語中，也可以發現其他文學及套語的技巧。像「凡事著忍耐，忍耐就妳的」，其中「忍耐」二字在句尾與句首的位置相頂，即形成「頂眞」的效果；而「凡事著忍耐，忍耐就妳的，妳若忍耐不住」，則不斷「重複」忍耐二字，可以讓人很自然地捕捉整段話的重點，就是要聽者「忍耐」。

換言之，阿玉之所以長年記得養母責罵的內容，並不是因爲用心聽和特意背誦，而是由於對仗、押韻、頂眞、重複等口語文化「套語工具」的使用，讓這些話語更容易記憶，也讓阿玉能更容易得知養母表達的重點爲何。

這種運用重複、韻律、對仗等方式說故事的特色，在其他報導人身上也可看到。譬如住在台中外埔的劉嬸，早年與公婆及小叔、大伯同住，因受不了工作量太大，一度回家向父母哭訴。她轉述父親當時勸解的話：「沒關係，卡忍耐，兄弟不能吃一輩子，兄弟永會分食，會作伙是

卡久，沒作伙是卡快，兄弟永會分食，古人說忍耐就是我們的。」而她也不斷重複父親引用的那句俗諺「兄弟永會分食」，說明後來她繼續忍耐的原因。

不僅是日常會話富含韻律性，有些報導人甚至擁有自創詞曲的能力。在進行訪談時，八嬸婆曾透露，她創作了幾首歌，並唱給研究者聽。她以閩南語寫作歌曲，每首都押了韻，令人非常驚訝。畢竟，一般識字人，儘管受過文字教育，但卻未必有能力從事詞曲創作，何況每句歌詞皆押韻，這幾乎已達專業詞曲創作者水準。

（二）文字文化工具箱

雖沒進入學校學過文字，但是文字文化的一些習性，仍間接影響報導人，使某些人在口語表達時，也能稍加使用文字文化工具箱，達成其意圖。以下就研究者觀察到的使用情形，作一說明。

1. 資訊搜尋與記錄工具

在參與觀察過程中，研究者發現，大半報導人都有一本自己的「電話簿」，它可能是一本小冊子或幾張紙片，但上面通常只有密密麻麻的一堆數字，沒有文字。

因爲好奇紙片上的一排數字如何記憶與辨別，研究者詢問了幾個報導人，孰知每個人的邏輯都不相同。舉例而言，夏大姐是以家人排行作爲記錄的順序；二姨則是利用少數識得的文字和數字，代替符號的指示功能，因此她在大阿姨的電話號碼前，寫上阿拉伯數字「1」，三姨的號碼前寫上「3」，家中老大的號碼前寫上「大」。

此外，有些報導人是以「區域號碼」分類方式進行記憶。像是八嬸婆說，699 是村裡電話的開頭，如果要記村裡其他朋友的電話，只要背後面四個阿拉伯數字就好了。

2. 三段式邏輯推理

阿玉在說明電話記憶時，曾回答：「那個電話是桃園弟弟的，因為它的開頭是 03，03 是住桃園的，我只有這個弟弟住桃園。」阿玉的這

幾句話，使用了某個程度的三段式邏輯推理過程。

三段式邏輯推理最著名例子爲：「凡人必會死，某人是人，故而某人會死。」如果我們依照這個架構來檢視前述阿玉的話，可以發現她的邏輯如下：「所有桃園的號碼都是 03，我弟弟的區域號碼是 03，所以這個電話號碼是我弟弟的。」

此一推理過程，也可在夏二姐身上看到。一次，村中有個孕婦來家中拜訪，夏二姐看著她的肚子說：「肚子尖尖生兒子，妳的肚子這麼尖，一定會生兒子。」夏二姐的邏輯如下：「肚子尖的會生兒子，這個孕婦的肚子是尖，所以會生兒子。」

從兩位報導人的口語反應，可看出文盲在某個程度上，也會利用「三段式邏輯推理」。只不過這個推理過程，不似一般文字人那麼直接和明顯。

3. 分析式思考

李嬸是陳水扁的支持者，訪談進行期間，正值台灣總統大選前後，對於當時國民黨舉辦三一三嗆聲活動的成功，她覺得那是國民黨跟連戰花了不少錢才搞起來的，不是人民自發的行爲，她說：

> 「那我朋友有去在說啦，去的人給兩千塊啦，另外，遊覽車啦，遊覽車不用錢，像你做司機，我一台遊覽車來到台北，多少錢，你不用給我錢嗎，不然說人沒錢，那遊覽車不用錢，不用加油，不用加油會走嗎？水道水〔自來水〕難道會走。」

由此可見，對於三一三造勢場面浩大，李嬸主要從經費花用多寡，提出她的論點。她特別從朋友的親身經驗、活動所需的司機費用、遊覽車的租用，及油錢等四個面向分析，進而推論，國民黨舉辦這個活動之所以這麼成功，是因爲花費了相當多的人力和金錢，而不是透過人民自發性參與才達成。

或許可以這麼說，李嬸將經費花用這個整體概念，分解爲朋友的親身經驗、活動所需的司機費用、遊覽車的租用，及油錢等四個組成元素的作法，就是使用了文字文化的分析式思考工具。只不過李嬸的分析和論述階層只有「經費花用」一項，不像談話性節目的主持人和來賓，會從「樁腳文化」、「組織動員」、「經費花用」、「領袖魅力」等諸多面向切入，從事更全面性的評論，並會再就各面向內涵進行深度分析，使其內容變得更爲豐富及層次分明。

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偶爾也可看到報導人自我分析的過程。例如有一次，研究者問二嬸婆，「爲什麼不買隻新手機？功能多又好玩，而且手機買了又很少打，不是很浪費嗎？如果不會用，我教妳就好了。」結果她回說：

> 「我老人了，我有的用就好，方便就好，我也不學，我不太會打，是因為我不學而已，我是會，不過我不需要學，因為我學會了，我會亂打，會打到朋友那裡，我女兒就要多繳錢。我是考慮這樣，那個錢都是我女兒在繳，我是故意不學的，不然有的手機〔號碼〕，我只要把它寫下，我就會打。」

據此，可以看到二嬸婆因果分析的能力。因爲知道自己會亂打電話，怕造成女兒負擔，所以刻意要求自己，不要學會手機的使用功能，也不要記下太多的手機號碼，以免到時候亂打，讓電話費暴增，害女兒要多繳錢。

4. 抽象思考

由於家人都在上學或工作，有些報導人白天一個人在家，爲免無聊，會利用手邊傳播媒介，獲取生活資訊並娛樂自己。以阿玉爲例，便有一套固定的媒介生活劇本。

早上九點到十點間，她會轉台看「台藝」電台的綜藝節目「天天二十四點」。這個綜藝節目的內容主要有兩部分，第一部分爲划酒拳比賽

，由衛冕者與挑戰者競賽，裁判在一旁計分，採二十拳計，先拿到十一分就獲勝，衛冕者其後再接受挑戰者挑戰，一直到五連勝後，可得高額獎金；第二部分爲歌唱「對嘴」比賽，其形式是由主辦單位播放原歌手歌唱帶，看參賽者「對嘴」表現及台風如何。而中間所播放的廣告，大部分爲藥品廣告，像是「流民拳筋骨散」、「安腦丸」、「健兒寶」等。

因爲經常收看對嘴歌唱比賽，長久觀摩評審評語，及其要求參賽者改進的地方，阿玉也自行整理出一套看法。每當參賽者一演唱完畢，她就會開始下評語：「這個不會得等〔得名〕啦，他剛才唱的時候嘴巴不夠開，手的動作太小，對嘴的時間沒有抓好。」若問怎樣才會得等，她說：

> 「嘴要張大一點，手的動作要較自然啊，對嘴的時間要剛剛好，這樣才會得等啦！」

藉由阿玉的說法，可以看出，她從長期觀看評審的給分標準中，歸納了一套競賽標準的原理原則。也利用這套原理原則，自己扮演起裁判角色，爲所有參賽者評分。

事實上，抽象思考的運作過程，在報導人日常生活中，並不易觀察，且亦受研究者問話技巧影響。在訪問夏奶奶時，研究者曾模仿蘇聯學者 Luria（1974/1976）[11]以實地實驗方式，將可樂、果汁、香蕉、碗放在桌上，要她分類，測驗其抽象認知技能。一開始她說，這不能分類，可樂就是可樂、果汁就是果汁、香蕉就是香蕉、碗就是碗；硬要她分類，她便將其分成四類，說每種都是一類，它們全部不同類。後來研究者隨手拿起果汁和可樂，再問她這兩個東西又可以叫什麼，結果她回答：「飲料啊！」換言之，夏奶奶並非沒有抽象歸類的能力（她能將可樂和果汁歸類爲飲料，且這是所有報導人都做得到的），而是研究者問話技巧及報導人所處環境習慣對話方式的問題;因爲在她所處的文化環境中，不會有人這樣提問，所以她不了解問話的意思是什麼。

伍、分析說明

一、報導人口語表達特色

（一）大量套語工具使用

以上許多個案觀察說明，文字時代口語人的口語表達中，最大特色爲充滿台灣民間流傳的俗、俚和諺語，這些諺語是其生活中很重要的說話工具，有時用來評論事情，有時用來訓誡他人，有時用來解釋自己的所作所爲，有時則將它溶入故事敘說中，使用的時機和功能都不相同，但卻有辦法巧妙組合，猶如渾然天成。這種同一文化工具，具多重功能的現象，就如同 Brewer（1985）所述，在口語傳統中，爲了便於行事，許多敘事同時會執行多項功能，故而單一的口語文化敘事，可能同時達成多種文類功能。

另外在故事敘述時，我們也看到報導人經常使用「角色扮演」工具箱，以聲調轉換、表情變化和增加手勢等輔助工具配合口語，強化故事的生動性。當然，這個部分或許也能在一般識字人身上觀察到，但如果就使用程度與技巧而言，文盲仍是技高一籌。

（二）混血文化工具箱的使用

不過，在口語表達行爲及故事敘述過程中，仍可發現文盲對於文字文化工具箱的使用，存在各種可能。諸如「資訊搜尋與記錄」工具，幾乎每個報導人皆會使用；至於「分析式思考」、「抽象式思考」、「三段式邏輯推理」等文化工具箱，由於觀察不易，再加上運用習慣不同，雖不是在每個報導人身上都看得到，但仍有部分報導人以此從事時事分析或評審標準的歸納等。

亦即，不識字的文盲，在口語表達時，不只會使用口語文化的「套語工具」、「角色扮演」工具箱達成目的，同時某個程度，也能有效運用文字文化的「分析式思考」、「抽象思考」、「三段式邏輯推理」、「資訊搜集與記錄」等文化工具箱。

換言之，生活在一個口語和文字文化混血的環境下，透過文化情境的激發，文盲可同時使用口語及文字文化的文化工具箱，解決日常生活所遭遇到的各式困難，並達成其意圖。

（三）口語文化工具箱的使用偏向

雖然文盲在口語表達時，會交互使用「口語文化工具箱」和「文字文化工具箱」以達成意圖，不過根據研究資料可以發現，報導人在使用文字文化工具箱解決問題的頻次與使用技能上，仍較口語文化工具箱來得差。

比方說，雖有屬於自己的電話簿，但由於沒有更進一步的分類概念及文字工具，所以多數報導人還是停留在工具箱的粗淺使用層次，電話簿只出現一長串數字，不具有較深入細緻的「姓名」、「出生年月日」、「關係」等概念分層、分類系統，進一步幫助號碼的記憶與使用。又如，雖有報導人會使用「三段式邏輯推理」，解決辨視和記憶電話號碼所遇困難，但推理過程，似乎不似一般識字人那麼直接和明顯。

相反的，在口語文化工具箱的頻次與技能使用上，報導人的表現則來得多且好些。像是日常生活中不時出現的俗、諺、俚語，和日常用語即興創作，她們就使用套語工具箱的對仗、押韻、頂真、重複等多個文化工具，顯然在這部分的使用技巧相當純熟，且具有自創對仗押韻話語的能力。此外，許多報導人幾乎可以不使用任何旁白，完全以轉換聲調的角色扮演工具，讓聽者了解對話內容，更見其技巧之純熟。

二、媒介文化工具箱的影響

如前所述，透過混血文化情境的激發，文盲在日常生活的口語表達行爲中，可同時使用口語文化的「套語工具」、「角色扮演工具」及文字文化的「三段式邏輯推理」、「抽象式思考」、「分析式思考」等文化工具箱。然而，人們在使用這些文化工具箱的同時，是否如此自覺，是件值得深思的問題。

以阿玉引述養母的話爲例：「妳是要被人算貨，還是要被人算塊？工作學就會，凡事著忍耐，忍耐就是妳的，妳若忍耐不住，妳就連回〔丟臉〕。」本研究曾分析指出，養母使用了口語文化的對仗、重複、頂眞、押韻等套語工具，使得這段話語更便於記憶。然而沒讀過書的她，是否曾在開口的一瞬間思考——現在說這段話，我要用「對仗」，下段話我要用「頂眞」，再過來還要使用「押韻」，這樣別人才能記得住——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因爲在她的腦裡不見得有「對仗」、「押韻」等概念存在，這些技巧的出現，應該只是受過文字教育的研究者，所加諸的分析罷了。

口語人之所以會這樣表達，並非是有意識的選擇，而是其日常生活可能就是以一種「富韻律節奏」的方式進行，此即是她的生活常態。換言之，口語文化的套語工具，在其日常生活口語表達時，正不知不覺影響著她，才使她的話語得以出現對仗、押韻、重複等情形，只不過她本身並未意識到這件事。

進一步言，在日常生活中，雖然我們利用了各式文化工具箱，解決問題及達成目的，但同時這些文化工具箱也會反身回來，影響我們的思考及表達行爲，使我們的思維及生活，或以某些韻律的方式運作著，或習慣性地從事某些歸納或推理的過程，並得出結論，甚至將這些結論套用在周遭人物身上，但這種影響卻不是那麼容易被發覺。

而這正如 Bynum（1978）、Ong（1982）所述，套語使用者不見得爲有意識地使用套語，然其日常生活中，很容易就展現出某些固有想法及韻律節奏。

陸、結論與建議

透過文獻檢閱及十七位報導人田野觀察，本文發現，文盲的口語表達特色爲大量使用套語及角色扮演等口語文化工具箱，偶也操持文字文化所慣用的資訊搜尋與記錄工具、抽象、分析、三段式邏輯推理等思維

工具，但整體來說，主要使用的還是口語文化工具箱，且日常生活亦較受其影響，展現出某些固有想法及韻律節奏。

一、發現與省思

此研究結果可說明以下兩個論點：

（一）所處媒介文化環境對口語表達行為產生影響

文盲即便不識字，但因生長在混血媒介文化中，某個程度仍可同時使用口語／文字兩種文化工具箱；亦即，儘管未受過正式學校教育，報導人仍能透過環境激發，習得文字文化慣用的分析、抽象、邏輯推理等思維。此一研究結果，駁斥了部分學者認爲文盲智能較低，缺乏抽象思考、分析、邏輯推理等高等心智能力的結論（Luria, 1974/1976），同時也說明所處媒介文化對人類口語表達行爲的影響。

（二）思維工具與教育程度影響文化工具箱使用

生活在混血媒介文化的文盲，主要使用的還是口語文化工具箱，且日常生活亦較受其影響。反過來說，文盲在使用文字文化工具箱解決問題的頻次與使用技能上，則較口語文化工具箱來得少且差。譬如，報導人在日常生活中，會大量使用俗、諺、俚語等口語文化工具箱，達成其各式意圖；但在「三段式邏輯推理」、「抽象思考」、「分析式思考」等文字文化工具箱的使用上，則較難進行觀察，且報導人的用法，並不似一般識字人那麼直接和明顯。此一研究結果，反映文盲的口語表達行爲，除了可能受生長於口語文化環境、慣用口語文化工具箱等因素影響外，另一個可能原因，則與其主要使用的思維溝通工具及所受教育有關。

由於文盲不使用文字媒介思考與溝通，故即便透過周遭媒介環境激發，習得某個程度的分析、抽象、邏輯推理等文字文化工具箱使用能力，在沒有可供分析比對的具象文字思維工具，及更進一步的分類概念與知識內容的狀況下，他們對於在文字文化工具箱的使用，還是只能停留在較粗淺的部分。

換句話說，就算媒介文化環境可以激發人們使用文化工具箱的潛力，但在使用技能及處理層次上，人們還是受限於思維溝通工具及教育程度的影響。故，影響一個人口語表達行爲的因素，除媒介文化環境外，仍需考慮使用者使用的思維溝通工具。

二、探討與提問

本研究結果可提供以下問題思考：

（一）第二口語文化隱含的文字思維教育功能

一般而言，媒介文化通常依循著口語／文字／電子的發展進程，然而本研究所觀察的對象，跳過了文字學習，直接進入電子媒介的使用，並經由日常接觸、觀看各式影音節目，以及在電子環境（第二口語文化）中與識字人的口語互動（例如觀看電視政論節目的政情分析，與識字人交換對政治事件的看法、歌唱對嘴節目的評審評論），習得某種程度的文字文化工具箱使用技能。此一研究結果，除可說明台灣電子文化中，充斥了文字文化內涵外，更進一步揭示了媒介文化環境所提供的教育功能。且此項教育功能，指的不單是表面的知識內容傳授，更重要的是各式深層思維工具箱之取得。

（二）媒介文化與思維溝通工具影響層次的差異

人們所處媒介文化及所習慣的思維溝通工具，皆可能對文化工具箱的使用產生影響。由此可進一步思考，媒介文化與思維溝通工具各自對文化工具箱的影響層次爲何。以目前研究結果及文獻看來，媒介文化的影響，主要作用在文化工具箱的產製與形塑，而思維溝通工具及教育程度，則可能影響工具箱使用技能及處理層次。但由於現階段研究樣本過少及其他相關研究不足，故尚待後續研究者共同釐清。

本文爲國內傳播學門第一篇以媒介文化工具箱觀點，針對文盲族群之口語表達進行探索的研究，然而，由於本土相關文獻有限，以及文盲

人口搜尋不易等因素，以致資料和樣本數仍有缺漏，還需要更多投入與補充。

在未來研究部分，建議可從三方面著手：一爲文盲族群研究，例如其媒介消費行爲、媒介訊息的收訊分析等，都是值得探究的問題。二爲不同媒介使用關鍵族群（例如不使用聲音媒介溝通的聾啞族群）的敘事及表達研究，相信能增進研究者對於各式媒介本質及媒介文化影響的了解。三則可針對各式文化工具箱的內涵、使用情形，及其所造成之影響，提出更進一步的探討；譬諸在何種溝通情境中，人們會使用哪些文化工具箱？這些文化工具箱，又對其言行產生什麼影響？此系列之問題，其實是人際傳播研究核心問題，但較少人關注。

直言之，關於人類心靈、媒介文化及文化工具箱的互動關係，還有太多未知的空隙，正等著我們填滿。這個研究只是個起點，不是終點。

智慧藏

註釋

〔1〕在本文中，口語人指的是未受過文字教育，不識任何文字系統，主要以口語作爲溝通與思考工具的文盲。選擇「口語人」一詞，旨在突顯思維溝通工具及其所造成的文化對人的影響。

〔2〕Ong 的研究特別重視「文字」對人產生的影響（Strate, 2002: x）；對他來說，文字爲人類最根本研究，因文字使我們有了文明。

〔3〕Ong（1982: 3）以第二口語（secondary orality）文化，稱呼充斥著電話、收音機、電視等口語電子媒介的文化環境。他認爲，第二口語與初始口語文化最大的差別，在於其口語性是根基於書寫與印刷文明，不似初始口語文化純由口語環境建構而成。本文以「文字時代」命名，除延續 Ong 的說法，強調文字媒介的重要性外，也認同其所述，即書寫與印刷媒介爲電子文明之根基，如欲探索電子文化的影響性，仍需回歸至文字文化的理解。

〔4〕根據巴蘇亞．博伊哲努（1996：4）的研究，口傳文學是口語文化民間文學的別稱，指的是以口頭創作，不運用書面文字傳播的一種文學，通常爲多人口述流傳的故事。由於這種文學如同是眾人共同孕育的創作，且在不同時空中流傳演化，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具有佚名（不知創作者）、變異（即情節內容和形構上的變化）的性質。

〔5〕在 *Oral Tradition* 已出版的二十一卷成果中，有若干期是特刊，其中卷四的一至二冊是阿拉伯口語傳統專輯，卷五的二至三冊是南太平洋專輯，卷六的二至三冊是塞爾維亞－克羅底亞專輯，卷九的第一冊是非洲專輯。目前此本期刊已全文上網，相關網址爲 http://journal.oraltradition.org。

〔6〕巴蘇亞．博伊哲努（1996）認爲，台灣大半原住民社會，並未發展出文字及書寫工具，其思想與風俗習俗的傳承，主要是透過口傳文學而來。

〔7〕曾有位不會說國語的阿公，一度令研究者以爲終於找到了文盲的樣本，但後來發現，他曾經受過日本教育，會唱卡拉 OK，甚至能讀報紙。進一步測試時，研究者請他讀出報紙裡的文字，結果他的文字和發音，完全是以閩南語作聯結。換句話說，他所閱讀的文字，完全是以閩南語發聲。

〔8〕前往澎湖七美訪談時，研究者曾遇到一個完全沒有受過學校教育的阿婆，她說自己會唱歌，令人好奇她是怎麼記得起這麼多歌詞。阿婆從房裡拿了聖歌教本，表示這些歌都在歌本上，接著她一字字的將聖歌歌詞用閩南語唸出。爲了測試她識不識字，研究者隨機寫了些字，並刻意問她牆上日曆的字是什麼，結果她都答對了。後來，研究者還請阿婆解釋歌詞的意義，結果她頭頭是道，每個字的意義都闡述得清清楚楚。令人驚覺到，在台灣，其實宗教聚會也是個非常好的教育場所，即使這些老人只是到教堂學聖歌、唱詩歌，但是經過這麼多年的耳濡目染之下，大家也都識得許多字。研究者甚至認爲這些老人學的東西可能比一般人還多，因爲在歌本後面，是以羅馬拼音編成的閩南語歌曲索引，而阿婆一字字地用羅馬拼音拼出文字的閩南語版，絲毫不含糊。

〔9〕澎湖七美是個非常小的村落，島上居民僅數百人，以漁業爲生，騎機車繞全島只需花費二、三小時。由於聚落小，人們互動非常頻繁，幾乎是有誰發生什麼事，全鄉人都知道。研究者在夏二姐家，看到桌子玻璃下，還壓著一張全鄉所有家戶的住址及電話通訊錄，顯示這一個村落的人是彼此互通聲息。

〔10〕關於「算貨」和「算塊」此二詞彙，因研究者只知其音，不知其用字和意義，曾要求阿玉解釋用字和字意，但她回說「不知道」，只知整句話，就是要她不要嫁完一家再嫁一家。後詢問家中長輩，指出應是「算貨「和「算塊」二詞。

〔11〕蘇聯心理學者 Luria（1974/1976）曾連續數年針對中亞的文盲，進行一系統認知發展實地測驗。結果發現，文盲慣以實用情境作

爲分類依據，缺乏抽象、邏輯、分析思考能力。在抽象能力測驗部分，Luria 要求文盲將下列四項物品分類：榔頭、鋸子、圓木、斧頭，以測試其抽象思維能力。Luria 原先以爲，這些文盲應該會將榔頭、鋸子、斧頭這三項「工具」分成一類，結果實際進行研究後，卻發現工人將這四個物品歸爲一類，因爲在日常生活中，這幾項物品都被放在一塊。在邏輯推理能力測驗部分，Luria 以某個三段式命題，要文盲依其字面意義進行推論。其命題如下：「在終年下雪的北方，所有的熊都是白色的。內華達在北方且終年下雪。請問那裡的熊身上是什麼顏色？」結果大半文盲的答案是：「我不知道，我又見過」，而不是 Luria 期望中的「白色」。

智慧藏

附錄

表 A：十七位報導人基本資料

姓名	地區	年齡	職業	觀察時間	觀察重點
二嬸婆	台南市	73	農	2002.08.06-2002.08.15	故事敘述、人際溝通、數字計算、媒介消費
大姨*	台南市	72	農	2002.01-2003.12	故事敘述、人際溝通、數字計算、媒介消費
蔡阿姨	台南市	70	工	2002.12.05-2002.12.11 2003.04.01-2003.4.10	麻將文字辨視、打牌策略、故事敘述、人際溝通、數字計算、媒介消費
三姨*	台南市	68	工	2002.01-2003.12	故事敘述、人際溝通、數字計算、媒介消費
阿玉*	台南縣	72	農	2002.01-2003.12	故事敘述、人際溝通、數字計算、媒介消費
李嬸	台南縣	70	商	2002.03.09-2002.03.15	做生意技巧、輾米機器操作與講解、故事敘述、人際溝通、數字計算、媒介消費
八嬸婆	台南縣	82	商	2003.10.16-2003.10.20	做生意技巧、故事敘述、人際溝通、數字計算、媒介消費
阿滿	台南縣	65	農	2003.07.09-2003.07.11	麻將文字辨視、打牌策略、故事敘述、人際溝通、數字計算、媒介消費
楊嫂	台南縣	69	農	2002.05.06-2002.05.20 2002.08.02-2002-08.15	麻將文字辨視、打牌策略、故事敘述、人際溝通、數字計算、媒介消費
蔡嬸	台中縣	73	農	2003.11.16-2003.11.20	麻將文字辨視、打牌策略、故事敘述、人際溝通、數字計算、媒介消費

表 A（續）

姓名	地區	年齡	職業	觀察時間	觀察重點
張阿嬤	台中縣	80	商	2002.07.31-2002.08.05	做生意技巧、故事敘述、人際溝通、數字計算、媒介消費
張阿姨	台中縣	56	商	2002.09.03-2002.09.10	做生意技巧、故事敘述、人際溝通、數字計算、媒介消費
劉嬸	台中縣	62	農	2003.03.25-2003.04.01	故事敘述、人際溝通、數字計算、媒介消費
二姨*	高雄縣	70	工	2002.01-2003.12	故事敘述、人際溝通、數字計算、媒介消費
夏大姐	澎湖縣	50	工	2003.01.15-2003.01-31	故事敘述、人際溝通、數字計算、媒介消費、游泳技巧、魚類辨視技巧
夏二姐	澎湖縣	52	工	2003.01.15-2003.01-31	故事敘述、人際溝通、數字計算、媒介消費、魚類辨視技巧
夏奶奶	澎湖縣	76	漁	2003.01.15-2003.01-31	故事敘述、人際溝通、數字計算、媒介消費

註：(1) 符號*代表該報導人為研究者親戚，日常生活互動頻繁。(2) 在職業一欄，標註「農」、「漁」者為一般務農、捕魚，標註「工」者則均為擔磚小工；唯標註「商」者之行業各有不同，分別是：李嬸－米店，八嬸婆－菜市場攤販，張阿嬤－補鍋店，張阿姨－自助餐店。

參考書目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1996）。《台灣原住民的口傳文學》。台北：常民文化。

馬成龍（1999）。〈傳播學在美國的發展：從 SCA 易名爲 NCA 談起〉，《新聞學研究》，58：245-256。

陳惠英（2000.06）。〈從海岸到星空——楊牧詩主題初探〉，「九十年代兩岸三地文學現象國際研討會」論文。香港。上網日期：2006 年 7 月 2 日，取自 http: //www.ln.edu.hk/clt/docs/con0006/paper/060005_hychen.PDF。

陳龍廷（2005）。《台灣布袋戲的口頭文學研究》。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謝錫金（1998）。〈游說文的教與學〉，李學銘（編）《大專寫作教學研究集刊》，頁 302-311。香港：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

葉明德譯（1978）。《傳播工具新論》。台北：巨流。（原書 McLuhan, M. (1964).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New York : McGraw-Hill.）

Brewer, W. F. (1985). The story schema: Universal and culture-specific properties. In D. R. Olson, N. Torrance, & A. Hildyard (Eds.), *Literacy, language, and learning* (pp. 167-194). London, New York, New Rochelle, Melbourne, Sydn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ynum, D. E. (1978). *Thedaemon in the wood: A study of oral narrative patterns*. Cambridge, Mass.: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Oral Literature.

Chafe, W. (1982). Integration and involvement in speaking ‘writing’ and oral literature. In D. Tannen (Ed.), *Spoken and written language: Exploring orality and literacy* (pp. 35-55). Norwood, N. J.: Ablex.

Chesebro, J. W., & Bertelsen, D. A. (1996). *Analyzing media: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s symbolic and cognitive systems*.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Donald, M. (1991). *Origins of the modern mind: Three stages in the evolution of culture and cogni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Finnegan, R. (1967). *Limba stories and story-telling*. Oxford: Clarendon P.

Finnegan, R. (1988). *Literacy and orality: Studies in the technology of communication*. Oxford: Blackwell.

Gee, J. P. (1994). Orality and literacy: From the savage mind to ways with words. In J. Maybin (Ed.), *Language and literacy in social practice* (pp. 168-192). England: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The Open University.

Goody, J. (1977). *The domestication of the savage mi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oody, J. (1987). *The interface between the written and the oral*.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avelock (1963). *Preface to plato*.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oloka, J. P. (1973). Homeric originality: A survey. *Classical World, 66*, 257-293.

Levi-Strauss, C. (1966). *The savage min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ord, A. B. (1960). *The singer of tal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uria, A. R. (1974/1976). *Cognitive development: Its cultural and social foundations*. (M. Lopez-Morillas & L. Solotaroff, Trans., M. Cole, Ed.).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orrison, K. F. (1987). Stabilizing the text: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knowledge in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forms of argument.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2*, 242-274.

Nowacek, E. J. (1993). Spoken language. In E. A . Polloway & J. R. Patton

(Eds.), *Strategies for teaching learners with special needs* (pp.198-232). N. J.: Prentice Hall.

Ong, W. (1982). *Orality and literacy: The technologizing of the word*. London: Methuen.

Ong, W. (2002). Literacy and orality in our times. In T. J. Farrell & P. A. Soukup (Eds.), *An Ong reader* (pp. 465-478). Cresskill, NJ: Hampton Press. (Original published in 1978)

Olson, D. R. (1994). *The World on Paper: The conceptual and cognitive implications of writing and read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arry, M. (1928/1971). *The making of homeric verse: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Milman Parry* (A. Parry,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cribner, S., & Cole, M. (1981). *The psychology of literac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trate, L. (2002). Foreward. In T. J. Farrell & P. A. Soukup (Eds.), *An Ong reader* (pp. ix-xiv). Cresskill, NJ: Hampton Press.

Swidler, A. (1986). Culture in action: Symbols and strateg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2), 273-289.

Tannen, D. (1980).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oral narrative strategies: Athenian Greek and American English. In W. L. Chafe (Ed.), *The pear stories: Cultural cognitive, and linguistic aspects of narrative production* (pp. 51-87). Norwood, NJ: Ablex.

Thompson, J. B. (1984).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ideology, polity pres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West, P. (1993). A matter of definition: Researchers push for spectrum of skills to describe literacy. *Education Week, 13*(6), 6.

04-吳翠松 1/14/2008 9:31 PM 頁面 47

Oral People in the Literate Age: An Exploratory Research

Tsui-sung Wu*

Abstract

This study, drawing upon the research of Ong and Swidler on orality and cultural tool-kits, aims to examine the oral behavior of illiterate people. Based on the study of the oral expressions of the informants, we find that illiterate people who grew up in an oral culture can use both the tool-kits of oral and literate cultures to express themselves, however, they do exhibit more expertise when it comes to oral tool-kit.

Keywords: cultural tool-kit, oral expression, illiteracy, media culture, formulas

智慧藏

* Tsui-sung Wu is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Hakka Institute of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National United University, Taiwan.